

Long, R. T. (2006). Realism and abstraction in economics: Aristotle and Mises versus Friedman.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9(3), 3.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经济学中的实在论与抽象：亚里士多德和米塞斯对弗里德曼

罗德里克·T. 朗 (Roderick T. Long) *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经常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不现实 (unrealistic)。新古典模型通常是“理想化的”；也就是说，它们忽略了现实世界经济的竞争、信息不完全、非货币激励和时间流逝等特征。弗里德里希·哈耶克曾将他 1953 年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实证经济学方法论》(Friedman 1953, 3–43) 描述为与凯恩斯的《通论》“一样危险”的著作 (1994, 145)，在这篇文章中，面对奥地利学派的批评，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使用不现实的模型进行了辩护，理由是任何好的解释性理论都必须是**抽象的**，而抽象的本质是不现实的。弗里德曼写道：

如果一种假说 (hypothesis) 能一点一点地“解释”，也就是说，如果它从围绕待解释现象的大量复杂和详细的环境中抽象出共同和关键的元素，并允许仅基于它们进行有效的预测，那么它就是重要的。因此，为了重要，一种假说在其假设 (assumptions) 中必须在描述上是错误的；它没有考虑和解释许多其他伴随的情况，因为它的成功表明它们与待解释现象无关。……我们将发现，真正重要和有意义的假说所具有的“假设”，会是对现实非常不准确的描述性表示，并且，一般来说，理论越重要，假设就越不现实。(Friedman 1953, 14–15)

奥地利学派对弗里德曼论点的一个明显回应是，新古典模型通常忽略的特征正是理解市场如何运作的关键特征，因此不能“与待解释的现象无关”。例如，在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中，这一过程（即正确的企业家判断得到奖励，错误的判断受到惩罚）是解释市场如何服务于消费者偏好的核心。但是没有一个假设了完全信息的模型可以将这个过程考虑在内。

然而，这样的回答对弗里德曼来说意义不大，因为他说的“解释”，意思和奥地利学派说这个词的意思根本不一样。作为一个经验主义者，如果一个理论能让我们预测现象的发生，弗里德曼就认为它解释了一个现象；而对于奥地利学派，用路德维希·拉赫曼 (Ludwig Lachmann) 的话来说，解释经济现象就是“使我们周围的世界在人的行动和计划的追求方面变得可理解 (intelligible)” (Lachmann 1977, 261–62)。正如哲学家彼得·温奇 (Peter Winch) 所表明的，这两种解释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 罗德里克·T. 朗是奥本大学哲学副教授，《自由主义研究期刊》(*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编辑，莫利纳里研究所所长。本文受益于 Stephen W. Carson, David Gordon, Guido Hülsmann, Mike Jarvis, Charles W. Johnson, Kelly Dean Jolley 和一位匿名审稿人的评论，以及 2004 年奥地利学派学者会议的反馈。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说他已经**理解**了这种行为？……韦伯经常说得好像最终的考验是我们制定统计规律的能力——这种统计规律将使我们能够相当准确地预测人们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做什么。……【但是】我们很可能能够以这种方式做出非常准确的预测，但仍然无法声称对这些人在做什么有任何真正的理解。这种差异与能够制定关于一种语言中可能出现的单词的统计规律与能够理解说该语言的人所说的内容之间的差异非常相似。……【一个】懂汉语的人，并不是一个对汉语中各种词出现的统计概率有牢牢把握的人。（Winch 1990, 115）

此外，即使预测能力是（*were*）经济学的中心点，弗里德曼主义的立场也将摇摇欲坠。假设事实证明，极其错误的假设确实具有一定的预测价值；从米塞斯主义的观点来看，当我们找到一个经验规律时，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正确的理论来确定这种规律是否可以预期适用于广泛或狭窄的情况。例如，假设在2001年初，我提出了一个理论，大意是宇宙中有一个恒定的托尔金力，每年都会产生一部托尔金电影。当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抱怨我的理论忽略了这一事实，即电影是人的行动的产物，而不是恒定的非人力量的产物时，我回答说：“哦，我知道那个。我的理论不应该是实在论的。问题是它是否是一个好的预测指标。”所以我在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对其进行了**检验**。你瞧，我的理论每年都有效！（2001年有了《护戒使者》，2002年有了《双塔奇兵》，2003年有了《王者无敌》。）但是，除非我留意了对这一系列电影发行的**真实**解释，否则我会对2004年的规律性失效大吃一惊。

但是，尽管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目前关注的并不是奥地利学派与实证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优点，这是我在其他地方详细研究过的主题。¹相反，我将争辩说，在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这一问题（即经济的哪些特征——以及基于什么理由——属于我们的解释性理论）之前，我们需要拒绝弗里德曼所使用的整个抽象概念。援引对抽象的另一种理解——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将使我们能够反驳弗里德曼的论点，并证明奥地利学派关于不现实的模型的立场言之有理。

这是本文其余部分的简要行程。首先，我将展示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中如何理解抽象。其次，我将用亚里士多德对抽象的理解来说明弗里德曼的论点是**如何**混乱的。第三，我将表明，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弗里德曼批判已经隐含在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著作中。第四，我将证明奥地利学派对不现实的模型的使用是合法的，但它不是弗里德曼所设想的使用。最后，我将展示奥地利学派-亚里士多德主义对弗里德曼的批判如何阐明弗里德曼和奥地利学派之间关于方法论先验主义的争论。

亚里士多德与抽象

¹ Long (forthcoming 2007); 有关简要介绍，请参见 Long (2004)。

亚里士多德的抽象理论可以看作是对以下担忧的回应。我们很容易看到，抽象概念并不严格适用于现实。例如，马这个概念应该适用于任何颜色的所有的马。但是，如果它的内容是任何一种特定颜色的马，显然它就不能这样做。例如，如果它是一匹棕色的马的概念，它就不能适用于一匹黑色的马。因此，为了适用于所有的马，马这个概念必须以一匹没有确定颜色的马作为其内容。但在那种情况下，这个概念仍然不能严格适用于任何实际的马；因为每匹实际的马都有某种确定的颜色。要么马这个概念以某种方式歪曲了现实，要么——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所说——它的实际指称不是任何物理的马，而是超然的、非物质的马的形式，它确实没有确定的颜色，我们熟悉的物理的马只是它的一种不充分的反映。因此，抽象要么有神秘的超凡脱俗的所指，要么根本没有所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它们都不能指代日常经验中熟悉的对象。

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难题的解决方案，是将抽象重新理解为一个关注事物的某些方面而忽略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在思考马这个概念时，我们关注一匹普通的马——无论是我们面前的一匹真实的马，还是在我们的心智的眼前的一匹想象的马——然后关注它与其他马共有的特征，而忽略了它的区别特征，例如它的特殊颜色。

在制作【几何】图表时……尽管我们没有利用三角形在数量上是确定的这一事实，但我们仍然把它画成在数量上是确定的。同样，一个思考的人，即使他所思考的不是量化的，也会在他眼前建立一些量化的东西，但认为它不是量化的。如果他所想的东西是量化的但不确定的，他就建立某种确定地量化的东西，但把它想成只是量化的。（*On Memory* 450a1-7）²

因此，亚里士多德不同意柏拉图的观点，即物理学和几何学分别研究不同种类的物体，分别是物理的和非物理的。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几何学研究物理对象的程度与物理学一样，但它以非物理的方式研究它们。这两种科学处理相同的熟悉的扩展对象，但几何学关注它们的形状和位置，同时从它们的物理体现中抽象出来：

我们必须考虑数学家与物理学家有何不同；因为物理物体有表面和体积、长度和点，所有这些都在数学家的范围内。……现在数学家也关心这些事情，但不是作为物理物体的边界而关心。……因为它们在思想上与运动是可分离的，尽管从这种分离中不会产生区别或错误。（*Physics* 193b22-36）

有许多陈述是只将事物的特征描述为可移动的，而不管它们各自是什么，不管它们的偶然属性如何，我们并不一定能由此得出，除了可感知的事物之外，还有一些事物是可移动的，或是这些可感知的事物之中有某种独特的性质，因此同样会有适用于可移动事物的陈述和科学，不是作为可移动的，而是只作为有形的，只作为平面的，只作为线的，作为可分割的，作为不可分割的但有位置的，和只作为不可分割的。……因

² 来自亚里士多德的所有译文都是我自己的。

为一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个人。现在算术家把他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东西，把属于他的东西当作人来看待，而几何学家则认为他既不是作为人也不是作为不可分割的，而是作为实心的。因为很明显，即使他不是不可分割的，任何适用于他的东西都适用于他，而不管这些特征如何。因此，几何学家在说他们讨论的对象是真实的存在时，是正确的。

(*Metaphysics* 1077b23–1078a29)

这种亚里士多德的抽象概念被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所复兴。例如，皮埃尔·阿贝拉德（Pierre Abélard, 1079–1142）承诺“解释为什么通过抽象获得的思想不是错误的。……即使它们怀有它们是什么之外的东西。”约翰·马伦邦（John Marenbon）总结了阿贝拉德的解决方案：

他解释说，当我将一个人仅视为实体或仅视为一个身体时，我并没有在他的本质中设想任何不存在的东西，但我没有关注他所拥有的一切。如果我认为他的本质只是实体或只是身体，我的想法就会是错误的。然而，将他仅考虑为实体或身体并没有错。“仅”必须适用于考虑，而不是适用于人存在的方式。（Marenbon 1997, 166–7）

一个世纪后，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5–1274）也持有本质上相同的立场，他写道：

抽象可能以两种方式发生。第一种……我们可能会理解，一个事物不存在于另一个事物中，或者它与它是分开的。第二种……我们理解一个事物而不考虑另一个事物。因此，在第一种抽象模式中，理智从另一个事物中抽象出一个并不是真正对另一个事物抽象的事物，这确实意味着虚假。但是，在第二种抽象模式中，对于理智来说，抽象出彼此之间并不真正抽象的事物，并不涉及虚假。……因此，如果当理智以不同于其本来面目的方式理解事物时，就说它是错的，如果这个词以其他方式指代被理解的事物，那就是这样。……因此，如果理智从物质中抽象出石头的种类，方式是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认为该种类不存在于物质中，那它就是错误的。但如果不是这样理解的话，就不是这样了。（*Summa Theologiae* I. 85. 1 ad 1; Aquinas 1999, 157）

阿奎那在这里区分了我们可以考虑的两种不同方式，比如说，将一匹马抽象掉它的颜色。我们可以把马考虑为**没**（consider the horse *as not*）有一种确定的颜色，或者我们可以**不考虑**马（consider the horse *not as*）有一种确定的颜色。把马考虑为**没有**一种确定的颜色，就是认为（或试图认为）我们思考的对象是一匹就是没有一种确定颜色的马——一种在物理现实中从未遇到过的生物，它要么存在于柏拉图式的天堂里，要么根本不存在。这种抽象歪曲了它所基于的具象，并与之矛盾。但是，不考虑马有一种确定的颜色，只是将马视为马，而不考虑它的颜色；这里就不涉及歪曲。

这两种类型的抽象通常被称为**精确的**（*precisive*）和**非精确的**（*non-precisive*）。正如阿尔芒·毛雷尔（Armand Maurer）所解释的那样：

精确是一种抽象模式，我们通过它从一个概念中切除或排除某些东西。抽象是对事物的考虑，既不包括也不排除在现实中与它相连的特征。没有精确性的抽象并不排除它所抽象的任何东西，而是包括整个事物，尽管是隐含地和不确定地。（Aquinas 1968, 39n 注释）

简而言之，精确抽象是其中某些实际特征**被指定为不存在**（*specified as absent*）的抽象，而非精确抽象是其中某些实际特征**不被指定**（*absent from specification*）的抽象。³柏拉图看不到抽象概念如何严格适用于物理现实，因为他看不到抽象可能是非精确的；我们可以说，他把一种关于某事物的不确定的思考方式（*an indeterminate way of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误认为了一种关于某不确定的事物的思考方式（*a way of thinking about something indeterminate*）。

这正是奥地利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弗朗茨·布伦塔诺（Franz Brentano, 1838–1917）如何描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对比的：

柏拉图认为，我们通过理解两种不同的事物来认识肉体 and 肉体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正好相反。……因为如果一个人想知道某事，而用他的智识去认识另一件事，从而达到他想要的知识，这显然是一种荒谬的断言。例如，一位科学家想知道他在地球上发现的晶体、植物和其他物体；因此，如果他认识了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四面体和八面体的概念，以及树木和草的概念，他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他的目的。（Brentano 1977, 86–88）

因此，布伦塔诺赞同亚里士多德的解决方案：

无论**是什么**都是完全确定的。……但是，一个完全确定的事物可能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情况下被思考。……因此，肯定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共性（*universals*）是错误的。但是否认任何真实的事物都可以对应于一种共性的观念**也是错误的**。……因为有很多东西可以对应它们。……当我们把对象**想成**石头，以及当我们把它**想成**这块特定的石头时，我们在每种情况下都有相同的思考对象。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把它**想成**什么是不一样的。（Brentano 1981, 25–26, 39）

近年来，这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抽象方法已被安·兰德（Ayn Rand）复兴。在共性问题，阿贝拉德是唯名论者，阿奎那是实在论者，而兰德则试图完全超越唯名论/实在论二分法；然而，三位思想家都站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传统中，三位都诉诸非精确抽象来解释概念如何应用于现实。兰德没有使用学术术语，但她的方法遵循了她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前辈们的方法。（尚不清楚兰德在多大程度上专门借鉴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而不是被她对亚里士多德方法的普遍采用引导至独立开发相同的解决方案；就此而言，同样的问题也适用于阿贝拉德，他只能获得亚里士多德语料库的一小部分。）

³ 关于这一区别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 Long (2001, 406–17, and 2002, 404–15)。

在《客观主义认识论导论》（*Introduction to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中，兰德写道：

如果一个孩子考虑一根火柴、一支铅笔和一根棍子，他会发现长度是它们共同的属性，但它们的具体长度不同。……为了形成“长度”的概念，孩子的头脑保留了这个属性并省略了它的特定测量。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用文字来识别这个过程，它将由以下内容组成：“长度必须以**某种**数量存在，但可以以**任何**数量存在。”我将把任何拥有它的存在物的属性确定为“长度”，它可以在数量上与长度单位相关，而无需具体说明数量。……牢记“省略的测量”一词在这种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测量被视为不存在；这意味着**存在测量值，但未被指定**。（Rand 1990, 11-12）

将测量视为不存在将是精确地抽象；相比之下，将测量视为存在而不指定它们是不精确地抽象。如果所有的抽象都是精确的，那么“知识的每一次进步”都将是“一次挫折，一次人类无知的证明”。既然“野蛮人知道人有一个头、一个躯干、两条腿和两条胳膊”，那么如果没有指定就意味着指定没有，那么“当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开始解剖尸体并发现人的内部器官的本质时”，我们不得不说他们的发现“使野蛮人的概念‘人’变得无效”，同样，“当现代科学家发现人具有内部腺体时，他们就使文艺复兴时期的概念‘人’变得无效”（67-8）。然而，在对抽象的正确理解上，只要任何未能包含在自己的概念中的东西仅仅是未被指定的，而不是被指定为不存在的，那么“即使【他的】知识范围是适度的，他的概念内容是原始的，它也不会与最先进的科学家头脑中相同概念的内容相矛盾”（43）。像她之前的阿贝拉德、阿奎那和布伦塔诺一样，兰德因此使用非精确抽象的概念来回应抽象歪曲现实的指控：

概念形成的基本原理（即省略的测量必须以**某种**数量存在，但可以以**任何**数量存在）等价于代数的基本原理，即代数符号必须被赋予**某个**数值，但可以被赋予**任何**数值。……在等式 $2a = a + a$ 中，任何数字都可以代替符号“ a ”而不影响等式的真实性。……让那些试图通过宣称他们在人（men）中找不到“人性”（manness）来使概念变得无效的人，通过宣布他们无法在 5 或 5000000 中找到“ a -性”（ a -ness）来尝试使代数变得无效。（18）

亚里士多德对弗里德曼

掌握了精确抽象和非精确抽象之间的区别后，我们现在可以转向弗里德曼对不现实的模型的辩护，并找出其缺陷。正如我们所见，弗里德曼认为一个有价值的经济理论“在其假设中必须在描述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没有考虑和解释许多其他伴随的情况”，而是“从大量复杂和详细的环境中抽象出共同和关键的元素。”弗里德曼当然是完全正确的，经济理论需要抛开大量复杂的细节；但只要它通过不去指定它们从而将它们搁置一旁，而不是指定它们不存在，它就不需要在描述上是错误的。例如，完全竞争模型不只是不去指定企业

家错误的存在；如果它指定了，它就无法解释市场的运作方式，但至少它不会说任何虚假的话。相反，完全竞争模型通过假设所有经济参与者都拥有完全（并且完全相似）的信息，明确指出不存在企业家错误——而奥地利学派反对的正是这种歪曲。George Reisman (1968)将完全竞争模式描述为“柏拉图式竞争”时，是正中目标的。而弗里德曼正是犯了柏拉图式的错误，将所有抽象都视为理想化的一种形式。

弗里德曼混淆了精确抽象和非精确抽象的进一步证据在以下段落中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理论或其“假设”不可能在经常被赋予该术语的直接描述意义上是彻底“现实的”。一个完全“现实的”小麦市场理论不仅必须包括直接构成小麦供需基础的条件，还必须包括用于进行交易的铸币或信用工具的种类；小麦商人的个人特征，例如每个商人的头发和眼睛的颜色，他的出身和教育，他的家庭成员数量，他们的特征、出身、教育等；小麦生长的土壤种类、物理和化学特性、生长季节的主要天气；种植小麦的农民和最终使用小麦的消费者的个人特征；以此类推。……没有一个理论的批评者会接受这个逻辑极端作为他的目标。他会说，被批评的理论的“假设”“太”不现实了，他的目标是一组“更”现实的假设，尽管仍然不是完全地和盲目地如此。（Friedman 1953, 32）

弗里德曼的错误在于把一个结合了血统、眼睛颜色等的理论作为实在论的“逻辑极端”。但实在论并不要求指定所有这些无关的特征。它只是要求也不要具体说明它们的不存在。那些批评新古典模型缺乏实在论的人并不是在寻求一种更接近现实的精确抽象；相反，他们正在寻求一种根本不精确的抽象。要问的正确问题不是“我们的理论应该多接近现实才能产生有用的预测？”而是“我们的理论应该包含多少特异性才能产生有用的解释？”⁴谈论实在论的程度是错误的，即使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时也会这样做。所有的非精确抽象都是同样现实的：“库乔是条圣伯纳犬”并不比“库乔是条狗”更现实（尽管它更精确，就像2.00的测量值比2.0的测量值更精确一样——并不更正确，但正确到更有效的数字）。正如法国社会学家查尔斯·孔德（Charles Comte, 1782–1837）——主观价值经济学家让-巴蒂斯特·萨伊的追随者，并因此在某些方面是一位原初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指出：

绝不能将不完全的分析与错误或不忠实的分析混为一谈。前者仅表示所描述对象的部分特征；但它所描述的一切都是正确的，并且它避免断言除了它所概述的特征之外不存在其他特征。后者描述的事物不同于它们的本质，或者完整地呈现了并非如此的描述。（Comte 1826, 1, 79–80）

5

弗里德曼试图通过指出这些假设在几何和物理学中的合法使用来为经济学中不现实（即错误）假设的使用辩护。例如，关于几何，弗里德曼写道：

⁴ 参见，例如，O'Driscoll and Rizzo (1996, 21); Garrison (2001, chap. 1); Caldwell (2004, 333)。

⁵ 自己的翻译。

欧几里得几何是一种抽象的模型，逻辑上完整且一致。它的实体是精确定义的——一条线并不是一个长度比它的宽度和深度“长得多”的几何图形；它是一个宽度和深度为零的图形。这也显然是“不现实的”。

“现实”中不存在欧几里得的点、线或面之类的东西。（Friedman 1953, 25）

我们已经看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将如何处理这个例子：**线**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现实，不是因为现实包含了有长度但没有宽度或深度的物体，而是因为现实包含的物体，其宽度或深度可以用非精确抽象拿掉，从而只考虑其长度。同样地，**点**这个概念可以应用于现实，不是因为现实包含了有位置但没有大小的物体（量子物理学家可能会认为它确实如此，但几何的实在论并不取决于他们这样认为），而是因为现实包含的物体，其大小可以用非精确抽象拿掉，从而只考虑其位置；等等。因此，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几何学家在说他们讨论的对象是真实的存在时，是正确的”——尽管将它们视为柏拉图形式而不是普通的物理物体是错误的。

至于物理学，弗里德曼遵循将物理定律视为仅适用于理想化条件的广泛实践。例如，他写道：

一种公认的假说是，在真空中落下的物体的加速度是一个常数——在地球上为 g ，或大约 32 英尺/秒平方。……在宽泛的情况下，落入实际大气中的物体的行为**就像**它们是落入真空中一样。……这个公式是公认的，这是因为它有效，而不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近似的真空中——不管这意味着什么。（16–18）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下落的物体并没有真正以精确等于 g 的速率沿着精确的直线向下移动，因为地球的引力从来都不是作用在下落物体上的唯一力。因此，如果我们将万有引力定律解释为断言物体确实以这种方式运动，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得出结论，万有引力定律并不严格正确，或者它仅适用于理想化的世界而不适用于现实世界。然而，万有引力定律在预测实际物体的实际运动方面肯定是有用的，因此至少在物理学中，使用“不现实的”假设是正确的。

在这里，弗里德曼再次混淆了精确抽象和非精确抽象。正如吉多·许尔曼（Guido Hülsmann）所指出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理解的经济规律不是较早事件和较晚事件之间的关系，而是实际事件和反事实事件之间的关系：

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基于这一洞见，即人的行为和人的思想**只是**人的行动的一部分，即被实现的部分（即“那里”）。人的行动的其他部分还没有——或者迄今为止还没有——被实现。这些尤其是（a）人的行动所追求的目的和（b）可以选择的已被放弃的替代选项。从被实现的意义上说，目的和已放弃的替代选项显然不是世界的一部分。然而，不可否认它们有某种形式的存在，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使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能够将人的行动（行为和思想）的已实现表现解释为未实现部分的必然

结果。……相比之下，新古典经济学家试图以其他可观察到的现象……来解释可观察到的现象。（Hülsmann 1999, 4–6）

例如，我们并不能保证最低工资法会导致失业率高于法律之前的失业率；因为失业水平受许多不同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些因素会相互抵消。经济法则所保证的是，最低工资法下的失业率将高于没有法律的情况下**本会有**的失业率。（这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从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和亨利·黑兹利特的著作中熟悉到的，“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之间的区别。）因此，最低工资法导致失业的理论并不是一种精确抽象，仅适用于一种理想化的案例，其中最低工资法是影响失业的唯一因素；相反，它是一种非精确抽象，适用于涉及最低工资法的所有情况，而不管其他哪些因素在起作用。正如许尔斯曼所说：

因为反事实法则将一个可观察到的事实与一个反事实的替代选项联系起来，所以除了所考虑的事实之外还存在哪些其他事实，这些其他事实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修改，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事件的进程，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Hülsmann 2003, 74）

我想指出的是，许尔斯曼在这里所说的经济规律同样适用于物理规律：万有引力定律也不是只适用于真空中的运动的精确抽象，而是一种非精确抽象，它对其他力量**省略**不提，但并不因此认为它们不存在。一个下落物体的轨迹是所有作用在它之上的力的总和；如果在给定的时间段内，如果重力是唯一作用在物体上的力，物体会下落 5 英尺，那么无论其他什么力可能作用在物体上，我们仍然可以预测，这个物体最终会比它在没有重力作用的情况下**本会有**的**低五英尺**。（尽管参见脚注中的限定条件。）⁶

因此，万有引力定律正确地描述了物体的运动，不仅在其他力相对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而且在它们非常强大的情况下——与重力一样强，甚至比重力强得多。因此，我倾向于不同意罗斯巴德的建议，即“诸如不存在摩擦之类的错误假设”虽然在经济学中不合适，但“在物理学中是有道理的【和】有用的”⁷（Rothbard 1997, 102）。著名的科学哲学家最近提出的建议，即“物理法则在说谎”（Cartwright 1983）在物理学上犯了与弗里德曼在经济学上所犯的同样的错误。

⁶ 这里必须做限定：除非它被拉下导致它遇到一种它在别的情况下不会遇到的反作用力——例如，与障碍物相撞并因此向相反方向反弹。类似的限定条件适用于经济案例：如果“西红柿供应量的增加（意外地）导致对这些西红柿的需求增加”，那么“西红柿价格不一定低于其他情况”（Hülsmann 2003, 74, 77, n. 24）。然而，即使这意味着不能完全消除其他条件不变的条款，它们的范围肯定会缩小。

至于重力的情况，上面的限定顺便回答了一位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反对意见：如果一个物体（比如一本书）放在桌子上，我们还能说这个物体在五英尺远的地方结束吗？在没有重力影响的情况下会向下吗？是的，在以下意义上：书施加在桌子上的向下的力正好被桌子施加在书上的向上的力所抵消。如果这本书在没有向下力的情况下遇到同样的向上力，那么在相关间隔之后它会比现在高五英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向下的力，书就不会遇到向上的力；因此有上述资格。

⁷ 对于即使在量子物理学中也不需要错误假设的主张的辩护，请参见 Miller (1987, chap. 11)。

虚构与摩擦

我们已经看到，弗里德曼对在经济学中使用不现实假设的辩护，因为精确抽象和非精确抽象之间的亚里士多德式区别而失败。我现在将说明，反驳弗里德曼的这种亚里士多德式方式如何已经隐含在了米塞斯对他自己的前辈的批评中。

米塞斯经常抱怨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法则只与某些类型的动机有关，因此只有在这些动机单独起作用的情况下才能产生正确的预测：

当他们区分出单纯的经济动机和其它动机时，古典经济学家只提到人的行为中贪婪的一面。……现代经济学把古典方法最后的追随者们(特别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其认识论辩护而提出的论据也摒弃为完全错误。根据这种蹩脚的辩护，纯经济学只涉及人类活动的“经济”方面，只涉及生产财富的现象，“只要这些现象不被对任何其它目标的追求改变。” (Mises 1985, 206)

因此，米塞斯感叹道，“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交换法则仅在理想情况下才成立，即假设人们就好像在真空中行动一样” (Mises 2002, 172)。

即使是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中最奥地利学派的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在他的《经济和谐论》(*Economic Harmonies*)中也写道，尽管“政治经济学的主体是人”，但“它并不包含整个人”：

宗教情怀、父爱母爱、孝道、爱情、友谊、爱国、慈善、礼貌——这些都属于道德领域，它包含了所有关于人的同情心的有吸引力的领域，而为政治经济学这门姊妹科学留下了关于自利的冰冷的领域。……它处理什么？在互不相识的人之间进行交易，除了简单的正义之外，他们不欠对方任何东西，他们正在捍卫和寻求促进自己的利益。它处理受其他主张——其中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没有立足之地——限制和限定的主张。……因此，政治经济学只从一个角度看待人，我们首先要从这个角度来研究人。(Bastiat 1964, 25–26)

古典主义者并没有真正傻到认为“自利”动机和“利他”动机可以清晰地分为生活的不同部分；但他们确实认为纯粹自利的假设足以预测人们在商业世界中的行为。简而言之，他们的立场与弗里德曼的立场颇为相似。当然，他们与弗里德曼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希望他们的理论至少接近于现实，而对于弗里德曼来说，只有一个理论的预测（而不是理论本身）必须与现实保持一致。⁸但对于古典经济学和弗里德曼来说，经济学原理都是**精确抽象**，因此并不**严格**适用于现实世界。

⁸ 比照 Rothbard (1997, 101) “如果一个人必须在两种经验主义之间进行选择，那么相信仅根据事实得出**结论**的检验程序似乎是愚蠢的。最好确保假设也是正确的。”

甚至早期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同样掌握了这种思维方式。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卡尔·门格尔坚持认为，经济法则描述了理想化的经济主体的行为，“努力充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体了解“经济状况，只要它对价格形成有影响，”“对所追求的经济目标或实现该目标的相关措施没有错误”，并且不受任何“损害其经济自由的外部力量”的影响。由于这些条件“仅在极少数情况下成立”，因此“通常**实际**价格会或多或少地偏离**经济价格**”（Menger 1996, 41–42）。对于门格尔来说，精确科学“试图确定一切真实事物的**最简单元素**”，而不考虑“这些在现实中是否作为**独立**的现象存在”，甚至“它们是否可以以它们完全的纯度独立地呈现出来”。他将“只追求经济目标的人”描述为类似于“绝对纯的氧气、纯的酒精、纯的黄金”，“绝对不能通过完整的经验现实来检验”，但“仅部分存在于我们的想法中”（29）。“正如纯力学否认存在充满空气的空间、摩擦等，”门格尔告诉我们，“经济学家断言人类**实际上**只受自身利益的引导，或者是无误的和无所不知的”（60–61）。我将是最后一个否认将门格尔与弗里德曼分开的巨大方法论鸿沟的人；然而，门格尔最后的这些评论与弗里德曼的立场之间的相似性是惊人的。

米塞斯完全拒绝门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的方法：

正如许多古典经济学家的追随者所实践的那样，经济学的任务不是处理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只是处理各种力量——它们以某种未明确定义的方式促成真实发生的事情出现。经济学实际上并不旨在解释市场价格的形成，而是描述与其他因素一起在该过程中起某种、未明确描述的作用的事物。（Mises 1978a, 75）

相比之下，在米塞斯看来，经济学“处理的是真实的人的真实行动。它的定理既不涉及理想的人，也不涉及完美的人，既不涉及神话般的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的幻影，也不涉及平均人（*homme moyen*）的统计概念”（Mises 1966, 651）。至于门格尔，米塞斯暗示他“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经验主义的影响太大，无法将他自己的观点带到其完整的逻辑后果”（Mises 1984, 27–28）。

另一位奥地利学派创始人欧根·冯·庞巴维克（Eugen von Böhm-Bawerk）也同样受到批评。米塞斯这样描述他的老师对米塞斯对坎蒂隆效应重要性的辩护的反应，写道：

【庞巴维克】对我逐步分析的说服力没有提出异议；他并不否认其结果——即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导致不同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既不同时变化也不均匀地变化，以及认为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同时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是不正确的。但他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摩擦现象”。据他说，旧学说“在原理上”是正确的，并且对于旨在“纯粹经济行动”的分析保持其完全意义。在现实生活中，存在阻力和摩擦，导致结果与理论得出的结果有所偏差。我试图说服庞巴维克相信从力学中借来的隐喻是不可接受的，但徒劳无功。（Mises 1978a, 59）

在米塞斯看来，主观价值论已经让“经济行动与非经济行动之间的区别”过时了，但“门格尔和庞巴维克未能得出所有必须从他们的基本立场得出的结论”（同上，122）。不是奥地利学派本身，而是米塞斯本人，才最终放弃了处理问题的经典方式。

米塞斯在这些问题上最清楚的陈述来自他对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理论的批判：

只有考虑经济理论的概念是否确实具有“理想类型”的逻辑特征，才能揭示韦伯误解的基础。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社会学概念不是这样派生出来的，即】“通过片面强化大量分散和离散的个别现象——与这些片面强化的方面相一致的现象在这里出现得多一点，那里少一点，有时根本不出现——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并整合成一个内在一致的概念表示。”……它们是在它们所指的每个实例中以相同方式找到的特征的概括。社会学的因果命题不是对通常发生但绝不一定总是发生的事情的表达。它们表达的是在它们假定的条件下必然总是发生的事情。（Mises 2002, 84 和 98）

一个理想类型——通过“片面强化”得出的概念——显然是一种**精确**抽象，现实的一个不现实的、改进的、风格化的版本。米塞斯用他自己的**非精确**抽象——其特征“在它们所指的每个实例中都以相同的方式找到”——反对了这个概念。⁹米塞斯对古典学派和早期奥地利学派的回应，因此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对那些否认抽象严格适用于经验现实的人的回应有着精确的相似之处。尽管这么想可能会让他感到惊讶，但米塞斯可以被视为将经济学中的主观主义传统回归其经院哲学的根源。（鉴于弗朗茨·布伦塔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在这个问题上支持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主义的立场——对奥地利学派的巨大影响，¹⁰米塞斯思想中同一主题的重新出现也许并不那么令人意外。）

理想化的使用

我们已经看到，弗里德曼错误地认为经济理论必须不现实才能抽象。然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自己也使用了不现实的模型，例如荒岛上的鲁滨逊·克鲁索，或米塞斯的“均匀轮转经济”。在使用这种精确抽象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是否犯了与弗里德曼同样的错误？

绝不是；因为这些模型在奥地利学派理论化中所起的作用与弗里德曼所推荐的作用截然不同。对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们来说，**精确抽象的目的是帮助**

⁹ 为韦伯辩护，米塞斯的学生 Alfred Schütz (1967) 回答说，由于行为学范畴本身就是理想类型，米塞斯的反对无异于警告“反对具体性太多而无特性太少的理想类型侵入经济学”

（246）。但米塞斯的反对意见不仅在于理想类型不够抽象（尽管他确实提出了这一反对意见；Mises 1990, 12–14），而且还在于它们以**错误的方式**抽象。

¹⁰ 比照 Smith (1994) 和 Gordon (1996)。

我们更好地掌握非精确抽象。正如罗斯巴德所写，“不真实的（false）假设在经济理论中是有用的，但只有当它们被用作**辅助结构**时，而不是被用作可以推导出经验理论的前提”（Rothbard, 1997, 102）。通过假想一个**只有**某些因素在起作用的例子，我们可以更容易地专注于这些因素的运作，而不会分心——但我们的目标是了解这些因素是如何在**任何**它们在起作用的地方发挥作用的。

巴斯夏对克鲁索经济学的讨论在这里很有帮助。克鲁索经济学应该代表完全脱离社会的人；然而，正如巴斯夏所说，任何这样的分离都必然完全是虚构的。巴斯夏告诉我们，虽然“丹尼尔·笛福的最初计划”是“将鲁滨逊·克鲁索单独扔到绝望岛上，赤身裸体，被剥夺了通过共同努力、专业技能、交流和社会可以带给一个人的一切，”然而，“如果笛福对他想要发展的思想过于忠实，没有做出必要的社会让步，允许他的主人公从海难中拯救一些必不可少的物品，例如食物、火药、一把步枪、一把斧头、一把刀、绳子、木板、铁等，就会剥夺他的小说的每一个逼真的痕迹。”此外，克鲁索“还把另一种价值千倍的社会财富带去了孤岛，这是海浪无法吞噬的：我指的是他的思想、他的记忆、他的经历，尤其是他的语言，没有这些他就无法与自己交流或形成他的思想。”对巴斯夏来说，这是“社会是人的必要环境的决定性证据，因为即使是小说家也无法让他生活在社会之外”（Bastiat 1964, 64）。简而言之，克鲁索经济学是一种精确抽象，它代表了人的行动的其他情况，而不是它现在的样子。

然而，巴斯夏并不谴责在经济理论中使用鲁滨逊·克鲁索。相反，他自己利用了克鲁索经济学：

如果人不交换，经济过程的每一部分都会发生在个人身上，我们很容易通过观察来确定它的好坏影响。……这四个要素——需要、障碍、努力、满足——的相互关系，在处于孤立状态的人的情况下是非常明显和可以理解的。（在这个世界中，）我们从来不会想说：

“太糟糕了，鲁滨逊·克鲁索没有遇到更多的障碍；否则他的努力就会有更多的出路；他会更富有。

“太糟糕了，大海把有用的物品、木板、食物、武器、书籍抛到了绝望岛的岸边；因为它剥夺了鲁滨逊·克鲁索的努力的出路；他更穷了。”

我说，人们永远不会提出这种荒谬的命题来作为神谕的真理。很明显，财富并不在于获得每种满足所需的努力量，而恰恰相反。……然而，这无疑是一个事实。……当我们将它们应用于绝望岛时显得如此荒谬的命题，在应用于法国时似乎是如此无可争辩的真实，以至于它们成为我们所有经济立法的基础。（Bastiat 1964, 95–96）

虽然巴斯夏没有使用这个术语，但他的观点很明显，即通过精简和简化，克鲁索经济学所涉及的**精确**抽象使我们更容易理解这一经济法则，即“财富不在于获得的每一种满足感都需要付出努力”所涉及的**非精确**抽象。

类似的评论也适用于米塞斯的“均匀轮转经济”，这种结构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斥责的完全竞争结构在表面上相似。两种结构都**精确**抽象掉了如不完全信息和新颖性这样的现实世界特征。不同之处在于，**均匀轮转经济不应该是现实世界的模型——无论是现实的还是其他的**。ERE 中发生的事情不能很好地预测现实世界经济中发生的事情；恰恰相反。相反，它的目的是帮助我们理解，例如，**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区别——通过向我们展示，在一个没有价格变化的世界中，利润会如何消失，而利息不会。因此，考虑 ERE 的无利润世界的目的不是让我们准备分析利润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而恰恰是使我们能够分析利润**不可**忽略不计的情况，以便当这两个因素都起作用并且它们的影响混合时，我们可以在概念上区分利息的作用和利润的作用。

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冯·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在解释他使用想象中的共产主义经济作为例子时正是指出了这一点：

虚构的形式不能误导任何人。当然，我可能会干巴巴地说我打算不考虑某些事实。但是，就像一个人希望观察某些事物而不受其他事物印象的干扰，并通过在干扰对象上铺上一层面纱来帮助他的感官，我想通过利用一个易于理解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形象来帮助想象，关注的东西实际上废除了我想在思想上忽略的一切。我所使用的虚构必须单独从这个角度来看待。（Wieser 1893, 243）

正如维特根斯坦所写的，在一个稍微不同的背景下：

如果我们想研究真伪问题，命题与现实的一致与不一致问题，断言、假设和问题的本质问题，我们看看原始的语言形式，其中这些思维形式在没有高度复杂的思维过程的混乱背景下出现，将非常有利的。当我们看到如此简单的语言形式时，似乎笼罩着我们日常语言使用的精神迷雾消失了。我们看到了清晰透明的活动和反应。……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通过逐步添加新的形式，从原始的形式构建复杂的形式。（Wittgenstein 1980, 17）

“在生活中，一切都在不断变化，”米塞斯说，“但为了思考，我们必须构建一种假想的静止状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在概念上隔离了各个因素，以便能够研究它们变化的影响”（Mises 2002, 117）。或者，用罗斯巴德的话来说：

“只有通过分析虚构的不变状态，我们才能对不断变化的现实经济世界做出适当的分析”（Rothbard 1997, 102）。

心理学的陷阱

我一直在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中的实在论方法辩护，并反对弗里德曼的方法。但这当然只是弗里德曼和奥地利学派之间的两大方法论争论之一；另一个涉及经验主义与先验主义。在不详细探讨后一个问题的情况下，我想提出一个假设，即弗里德曼对抽象的误解与他对米塞斯方法论先验主义的抵制是如

何相关的。我不认为一个是另一个原因，但我确实认为两者有一个共同的原因：未能区分**逻辑的**和**心理的**。¹¹

首先考虑弗里德曼对米塞斯的行动学先验主义的批评，他谴责这是“一种完全荒谬的观点”：

我认为，这种方法论方法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它】往往使人们无法容忍。如果你和我都是行动学家，我们对某个命题或陈述是否正确存在分歧，我们如何解决这种分歧？我们可以大喊大叫，我们可以争论，我们可以尝试在彼此的东西中找出逻辑上的缺陷，但最终我们没有办法解决它，只能通过争吵，说你是错的而我是对的。（引自 Ebenstein 2001, 273）

弗里德曼显然认为，与经验科学相反，在先验推理中，没有解决分歧的客观方法。但他为什么会相信这一点？为什么他如此自信，以弗里德曼所说的“在彼此的东西中找出逻辑缺陷”不太可能解决问题？我只能推测，弗里德曼认为先验推理是一个**主观**过程，它咨询自己内心的内容，注意一些本质上私人的内心声音的释放，第二个人无法检查。相比之下，经验方法呼吁公开可用的证据，因此允许客观性。但以这种方式考虑先验推理，恰恰是混淆了心理的和逻辑的。¹²

让我们以一个争议较小的先验学科为例：数学。如果两个数学家对计算结果存在分歧，他们不会发生冲突；他们也不会咨询私人的启示来源。相反，他们“试图在彼此的东西中找到逻辑缺陷”，并且可能其中一个会成功——因为**逻辑关系至少与经验关系一样“公开”**。方法论先验主义对任何人的私人心理状态都没有吸引力；正如大卫·戈登指出的那样：

当一个命题被声称是不言自明的（self-evident），这并不意味着一个人正在诉诸一种确定性的心理体验来支持这个命题。这样做恰恰不是声称这个命题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它的证据在这里依赖于别的东西——心理经验。（Gordon 1996, 29）

在提倡方法论先验主义时，米塞斯并不提倡依赖私人心理体验。毕竟，是米塞斯写道：“没有任何合理的方法可以支持或拒绝内心声音所建议的学说”

（Mises 1985, 165）。相反，他提倡依赖**可公开获得的**逻辑推理标准。对于米塞斯来说，先验主义解决了经验主义者之间棘手的争论，反之亦然，因为如果不求助于抽象理论，就无法在相互竞争的数据解释中进行选择：“关于经验的证明力的分歧只能通过回归普遍有效理论的学说——它独立于所有经验——来解决”（Mises 2002, 30）。弗里德曼当然可以自由地对米塞斯的先验主义论证的内容提出异议；但他能做到这一点的事实表明弗里德曼对其**形式**的批评是错误的。弗里德曼将行动学视为一种**主观的**、无法公开检验的方法，他犯了**心理**

¹¹ 关于解释这种区别的经典著作，参见 Frege (1977)。

¹² 弗里德曼批评的那种先验主义涉及**综合**先验，而逻辑则处理**分析**先验。但是，关于先验主义的分析形式和综合形式之间的区别的奥地利学派导向的批评，请参见 Long (2004, 361–67)。

主义的谬误：将逻辑关系与心理关系混为一谈。（顺便说一句，这种对心理主义的指责对弗里德曼的敏锐并没有特别的轻视。心理主义是哲学中最顽固和最引人入胜的错误之一；聪明的头脑已经在其危险的基础上建立了整个系统。）

解释弗里德曼对先验主义误解的心理主义可以说也解释了他对抽象的误解。弗里德曼未能看到非精确抽象的可能性，这表明他混淆了思考**行动**与其**内容**。当行动和内容被混淆时，很自然就会假设如果思考行动中缺少某些东西，那么思考内容中也一定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所有抽象自然会被视为精确的。但是，把思考行动和它的内容混为一谈，恰恰是把一个内在的**心理**项目和一个**逻辑**项目混为一谈。¹³

让我以最后的观察结束。无论他们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什么分歧，弗里德曼和米塞斯都同意先验伦理是不可能的。米塞斯争辩说，那些捍卫有合理理由的伦理的可能性的人，本质上是在声称道德知识是“通过内心的声音（即直觉）传授给人的”，并且没有认识到“关于内在的声音的诠释……找不到和平解决……分歧的方法”（Mises 1985, 53）。米塞斯对先验伦理学的批评与弗里德曼对米塞斯自己的先验经济学的批评之间的相似之处是惊人的——并且应该让我们怀疑米塞斯在这里陷入了弗里德曼自己在“内心的声音”的私人特征和逻辑的公共特征之间的混淆。

参考文献

Aquinas, Thomas. 1999. *On Human Nature*. Thomas S. Hibbs, ed. Indianapolis: Hackett.

———. 1968. *On Being and Essence*. 2nd ed. Armand Maurer, trans. Toronto: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eval Studies.

Aristotle. 1957. *Metaphysica*. Werner Jaeger,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51. *Physica*. W.D. Ross,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06. *De Sensu and De Memoria*. G.R.T. Ross,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astiat, Frédéric. 1964. *Economic Harmonies*. W. Hayden Boyers, trans. Irvington-on-Hudson, N.Y.: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Foundation.

Brentano, Franz. 1981. *The Theory of Categories*. Roderick M. Chisholm and Norbert Guterman, trans. Hague: Martinus Nijhoff.

¹³ 参照 Frege (1972, 324–25)。

———. 1977. *The Psychology of Aristotle: In Particular His Doctrine of the Active Intellect*. Rolf George, tr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aldwell, Bruce J. 2004. *Hayek's Challenge: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F.A. Haye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rtwright, Nancy. 1983. *How the Laws of Physics Li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omte, Charles. 1826. *Traité de Législation; ou Exposition des Lois Générales Suivant Lesquelles les Peuples Prospèrent, Déperissent ou Restent Stationnaires*. Paris: Sautetlet.

Ebenstein, Alan. 2001. *Friedrich Hayek: A Biography*. New York: Palgrave.

Frege, Gottlob. 1977. *The Frege Reader*. Michael Beaney, ed. Oxford: Blackwell.

———. 1972. "Review of Dr. E. Husserl's *Philosophy of Arithmetic*." E.W. Kluge, trans. *Mind* 81, no. 323 (July): 321-37.

Friedman, Milton. 1953. *Essays in Positive Econom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arrison, Roger W. 2001. *Time and Money: The Macroeconomics of Capital Structure*. London: Routledge.

Gordon, David. 1996. *The Philosophical Origins of Austrian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mises.org/philorig.asp>.

Hayek, F.A. 1994. *Hayek on Hayek: An Autobiographical Dialogue*. Stephen Kresge and Leif Wenar, e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ülsmann, Jörg Guido. 2003. "Facts and Counterfactuals in Economic Law." *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 17, no. 1 (Winter): 57–102.

———. 1999. "Economic Science and Neoclassicism."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no. 4 (Winter): 3–20.

Lachmann, Ludwig M. 1977. "Sir John Hicks as a Neo-Austrian." In *Capital, Expectations, and the Market Process*. Walter E. Grinder, ed.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Long, Roderick T. Forthcoming 2007. *Wittgenstei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Logic of Action: Prax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London: Routledge.

———. 2004. “Anti-Psychologism in Economics: Wittgenstein and Mises.” *Review of Austrian Economics* 17 (4): 345–69.

———. 2002. “Keeping Context in Context: The Limits of Dialectics.”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 3, no. 2 (Spring): 401–22.

———. 2001. “The Benefits and Hazards of Dialectical Libertarianism.” *Journal of Ayn Rand Studies* 2, no. 2 (Spring): 395–448.

Marenbon, John. 1997. *The Philosophy of Peter Abelar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enger, Carl. 1996.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Method of the Social Sciences*. Francis J. Nock, trans. Grove City, Penn.: Libertarian Press.

Miller, Richard W. 1987. *Fact and Method: Explanation, Confirmation and Reality in the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Mises, Ludwig von. 2002. *Epistemological Problems of Economics*. 3rd ed. George Reisman, tran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1990.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Richard M. Ebeling, ed.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1985. *Theory and History: An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1984. *The Historical Setting of the Austrian School of Economics*. Auburn, Ala.: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 1978a.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Hans Sennholz, trans.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 1978b. *The Ultimate Foundation of Economic Science: An Essay on Method*. 2nd ed.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 1966. *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3rd rev. ed. Chicago: Contemporary Books.

O’Driscoll, Gerald P., Jr., and Mario J. Rizzo. 1996. *The Economics of Time and Ignorance*. Oxford: Blackwell.

Rand, Ayn. 1990. *Introduction to Objectivist Epistemology: Expanded Second Edition*. Harry Binswanger and Leonard Peikoff, eds. New York: Penguin.

Reisman, George. 1968. "Platonic Competition." Part I: *Objectivist* 3, no. 8 (August); Part II: *Objectivist* 3, no. 9 (September).

Rothbard, Murray N. 1997. "In Defense of 'Extreme Apriorism'." In *The Logic of Action I: Method, Money, and the Austrian School*.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Schütz, Alfred. 1967. *The Phenomenology of the Social World*. George Walsh, Frederick Lehnert, trans.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Smith, Barry. 1994. *Austrian Philosophy: The Legacy of Franz Brentano*. La Salle: Open Court. Also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ontology.buffalo.edu/smith/book/austrian_philosophy.

Wieser, Friedrich von. 1893. *Natural Value*. Christian A. Malloch, trans. London: Macmillan.

Winch, Peter. 1990.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and Its Relation to Philosophy*.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Wittgenstein, Ludwig. 1980. *The Blue and Brown Books: Preliminary Studies for the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2nd ed. New York: Harper and Row.